

現實與表述： 國民政府的特派大員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證*

朱麗雙**

摘要

1938年初，因日本對華侵略戰爭而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獲得消息：藏政府已於青海塔爾寺(sKu vbum)附近找到已故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重慶、西寧和拉薩三方面隨之展開了一齣精彩的戲碼。藏政府需要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青海的大軍閥馬步芳想要巨額錢財，並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從西藏獲得商業利益；重慶的國民政府強調的則是作為中央的威信，以及藉此向世人宣示其對西藏的主權。利用近年解密的檔案材料，本文詳細敘述三方關於青海靈童赴藏一事的交涉過程與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及其他有關人員張威白、孔慶宗等在此次達賴轉世事件中的活動情形。本文指出，由於認識到達賴轉世對漢藏關係有莫大影響，吳忠信、張威白等人對藏政府一面勸導，一面催促，使得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經過，至少在程序上按照國民政府的意願，依照清朝「舊例」辦理；但是，他們同時認識到自己並沒有足夠實力為後盾，所以只能力求程序的完備，而無法影響藏政府對達賴轉世的具體操作。正因為如此，他們不得不在相關的文字表述上有所斟酌和修飾，著重強調國民政府對西藏主權之行使與拉薩當局對「中央意旨」之尊重，略而不提交涉過程的種種周折與不快。我們看到，這種現實與表述之間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們認識近代漢藏關係的困難。

關鍵詞：達賴喇嘛、認證、國民政府、吳忠信

* 本文的修改得到張廣達先生的幫助，謹在此表示深深謝意。筆者亦誠摯感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編委會與三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惠予指正，諸位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見使筆者深受教益。

** 收稿日期：2007年7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12月14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

一、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與國民政府的策略

1933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Thub bstan rgya mtsho, 1876-1933)圓寂，次年初，西藏民眾大會(tshogs vdu)通過掣籤，選出熱振呼圖克圖(Rwa sgreng Thub bstan vjam dpal ye shes rgyal mtshan, 1912-1947)擔任攝政。攝政在位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尋找已故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一年多後，1935年，藏政府開始按傳統慣例進行打卦占卜、請護法降神、觀看聖湖拉姆喇錯(Lha movi bla mtsho)顯影等工作。次年夏，藏政府正式派出人員到各地尋訪靈童，一年過後，傳稱紀倉佛(Kevu tshang sprul sku)一行於青海塔爾寺附近當采(sTag vtsher)祁家土司轄地（今青海平安縣，「祁」一作「祈」）找到的一名幼童，聰穎過人，靈異非常。這名幼童名拉木登珠(Lhamo don grub)，1935年7月6日出生，不僅生在藏區東部符合種種預兆和神示；而且據稱當地的山川景物和熱振佛前年在聖湖所見完全吻合：一座有三層琉璃屋頂及鑲金尖頂的寺院和一座有藍色屋頂的房子；最後經過測試，拉木登珠準確無誤地一一辨認出十三世達賴喇嘛用過的念珠、手杖和搖鼓等物品。尋訪人員確信，他們已經找到真正的達賴轉世，向藏政府請示下一步舉措。大約1938年夏，藏政府答覆道：儘快將拉木登珠帶到拉薩。¹

¹ 蔣致余致行政院長蔣介石電，1936年3月1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檔案（一四一）290，收入《1899-1949年有關西藏問題歷史檔案資料彙編》下（光碟資料，出版地出版社及年份不詳，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頁155-156；熱振為訪得拉木登珠靈異情形並請轉報中央政府免予掣籤事致吳忠信函呈，1940年1月26日，收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以下簡稱《達賴轉世檔》），頁282-286；Khemey Sonam Wangdu, "Discover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n Eyewitness Account," trans. Thubten K. Rikey, in Khemey Sonam Wangdu, Basil J. Gould and Hugh E. Richardson,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Enthronement of the 14th Dalai Lama: A Collection of Accounts*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2000; 以下簡稱DRE), pp. 9-20; B. J. Gould,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vol. 3, pp. 549-552; Bstan vdzin rgya mtsho, Dalai Lama XIV,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Auto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7), pp. 8-11; 鐵進元，〈第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坐床側聞記〉，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

爲防意外，尋訪人員和拉薩方面決定暫守秘密，試圖使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子香，1903-1975）及其他人相信，和在青海找到的其他幼童相比，拉木登珠更爲靈異一些，因此需要把他帶到拉薩，以便和在西藏本部找到的兩位幼童一起參加最後的認定。馬步芳下令將拉木登珠送到塔爾寺，交給其兄當采佛(sTag vtsher rin po che)看管，並向藏政府要索了 10 萬元法幣，但是遲遲不安排拉木登珠及尋訪人員回藏。²

1938 年初，因日本對華侵略戰爭而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亦獲得消息：西藏當局已於青海塔爾寺附近找到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將於當年迎回拉薩。國民政府認爲，達賴轉世是調整漢藏關係、行使對西藏主權的一個極佳機會，決定在噶廈(bkav shag)沒有呈報尋訪經過以前，嚴格防止其將靈童秘密接去西藏。³國民政府還責令駐藏諮議張威白(1897-?)在拉薩密切注意這方面消息，及時暗示藏方「按照向例報告中央辦理爲要」。⁴

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確立和清朝採用金瓶掣籤方式認定達賴轉世的問題，中外頗多論述。活佛轉世制度創始於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karma bkav brgyud)，後被格魯派(dge lugs pa)採用，通行的做法是由護法降神指定達賴轉世。八世達賴喇嘛(1758-1804)時，清朝於 1793 年設金瓶掣籤制度，用掣籤代替護法降神確認達賴轉世，以改變當時西藏社會上存在的達賴、班禪等「家族

資料文庫》（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卷 18，頁 597；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310-319。

² Khemey Sonam Wangdu, "Discover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n Eyewitness Account," in DRE, pp. 20-25; B. J. Gould,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pp. 552-553; Bstan vdzin rgya mtsho, Dalai Lama XIV,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Auto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pp. 11-12；吳忠信爲請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籤頒發坐床經費事致趙丕廉電，1940 年 1 月 28 日，《達賴轉世檔》，頁 288。參見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320-321。

³ 蔣鼎文爲轉送西藏將秘密迎請靈童之情報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8 年 3 月 31 日，《達賴轉世檔》，頁 134；蒙藏委員會致行政院呈，1938 年 4 月 26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以下簡稱〈行政院檔〉），檔號 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 67/1222-1226。

⁴ 蒙藏委員會致張威白電，1938 年 9 月 17 日，收入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臺北：蒙藏委員會，2005；以下簡稱《駐藏檔選編》），冊 2，頁 24。

姻婭，遞相傳襲，總出一家」的局面，此後第十世(1816-1837)、十一世(1838-1856)和十二世達賴喇嘛(1856-1875)均經由金瓶簽定。但是，這項制度的實行並非沒有遇到西藏方面的阻力，第九世(1806-1815)和十三世達賴喇嘛即以自幼靈異卓著、為僧俗大眾信服為由而免予金瓶掣籤，直接繼任為達賴喇嘛。⁵儘管如此，這項制度的創立實行為清朝確立對西藏統治地位的重要標誌之一，殆無疑義。⁶

十九世紀以降，在內外多重壓力下，清朝逐漸無法實施對西藏的有效管理。至二十世紀初，清政府及其官員更多次對藏事舉措失當，致使雙方關係急劇惡化。⁷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十三世達賴喇嘛號召他的屬民將清朝駐軍和官員驅逐出藏，隨後宣布「西藏與中國之間業已存在的關係是供施關係，並非以相互從屬為基礎」。⁸

民國成立後，歷屆政府一向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有意恢復盛清時代與西藏的關係，然而時異事殊，雙方多年無正式官方聯繫。1933 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次年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1884-1937)奉使入藏致祭，同時授命在可能情況下恢復漢藏「舊有 / 原有關係」。⁹所謂「舊有 / 原有關係」，是指

⁵ Luciano Petech, "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 A Chronological Study,"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2, pp. 567-583; Hugh Richardson, "The Dalai Lamas," *ibid.*, pp. 554-566; 柳陞祺、鄧銳齡，〈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籤的經過〉，收入鄧銳齡，《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頁 441-447；陳慶英，〈清代金瓶掣籤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實施〉，《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卷 27 期 3（2006 年 5 月），頁 1-6；卷 27 期 4（2006 年 7 月），頁 1-10；卷 27 期 5（2006 年 9 月），頁 7-14；卷 27 期 6（2006 年 11 月），頁 1-8。

⁶ 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4), pp. 27-28.

⁷ 有關此段歷史，參見 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275-317; 呂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 64-95；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頁 138-261；Wendy Palac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1922*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5), pp. 20-26。

⁸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46-247；鄧銳齡、陳慶英、張雲、祝啓源，《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 857-861。「供施關係」亦譯作「福田與施主關係」、「施主和僧侶關係」、「檀越關係」，藏文“mchod yon”。

⁹ 行政院為核准致祭專使入藏分贈禮品概算事致國民政府呈，1934 年 2 月 14 日；蒙藏委員會為藏方主張先議中藏問題待有結果再行冊封致祭典禮事致行政院呈，1934 年 9 月 22 日；蒙藏委

清朝和西藏的關係。然而由於不同的歷史記憶，有清兩百六十八年，清朝和西藏的關係應該具體指稱哪個時期，民國和西藏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民元以來的內地人士追溯歷史，往往強調從清初一直到雍乾盛世的兩者關係，特別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派福康安率大軍入藏，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兵，並於次年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清朝自此控制了西藏的軍事、外交，乃至達賴和班禪喇嘛的轉世，也就是完全確立了對西藏的統治地位，此後西藏即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¹⁰但是如上所述，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及秉承其意志的拉薩當局看來，五世達賴喇嘛(1617-1682)和清朝建立的是一種宗教上的供施關係，而不是西藏對中國在政治上的臣服。¹¹這樣，由於雙方認知懸殊，黃慕松沒能和拉薩當局達成任何協定。

1934年11月，黃慕松離藏內返，行前徵得噶廈同意，以「專使行署」名義，將總參議劉樸枕、參議蔣致余、無線電工程師張威白及衛士等若干人留在拉薩辦事。¹²1935年1月，劉樸枕因騎馬突發中風不治而亡。¹³1937年11月，蔣致余亦離藏內返。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蒙藏會）本欲派該會調查室主任高長柱去拉薩接替駐藏工作，但未能獲得藏政府的同意。¹⁴無奈之下，次年8月，

員會為照黃慕松意見解決中央與西藏問題事致行政院呈，1934年9月22日；汪兆銘為處理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對策事覆黃慕松電，1934年9月29日，《達賴轉世檔》，頁39、64、65、73；〈黃慕松奉使入藏冊封並致祭達賴大師報告書〉，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黃慕松、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以下簡稱《報告書》），頁7。

¹⁰ 參見黃慕松為中央與西藏關係恢復乾隆五十七年以後辦法難以辦到事致行政院電，1934年10月8日，《達賴轉世檔》，頁81；黃慕松致噶廈函，1934年11月27日，〈黃慕松奉使入藏冊封並致祭達賴大師報告書〉，收入《報告書》，頁44。

¹¹ 參見1934年9月16日噶倫澤墨(Khri smon Nor bu dbang rgyal)和黃慕松的談話及10月4日全體噶倫致黃慕松函，〈黃慕松奉使入藏冊封並致祭達賴大師報告書〉，收入《報告書》，頁31-32、35-36；黃慕松為噶倫提出中央與西藏為檀越關係並要求解決康藏川藏界務事致行政院等電，1934年10月5日，《達賴轉世檔》，頁78-79。

¹² 黃慕松為留蔣致余輔佐劉樸枕事致行政院電，1934年11月27日，《達賴轉世檔》，頁112。

¹³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73；孫子和，〈黃慕松入藏始末〉，《西藏史事與人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272。

¹⁴ 蒙藏委員會為派高長柱接替蔣致余駐藏職務事致噶廈電，1937年10月19日，收入多傑才旦主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以下簡稱《關係檔彙編》），冊7，頁3115。按，高長柱未能入藏接替駐藏工作的原因在於藏政府

行政院准予張威白以蒙藏會諮議名義，在國府駐藏人員未到拉薩以前，暫行負責接洽事務。¹⁵我們將看到，在隨後漢藏有關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的交涉中，張威白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話說回來，關於前述青海靈童之事，或者由於國民政府的「嚴密注意」和一再「婉勸」；¹⁶或者是藏政府認識到，沒有國民政府的干涉，青海方面不會輕易放人。1938年9月23日，西藏駐京辦事處(bod kyi don gcod khang)¹⁷轉報藏政府電文一通，稱達賴轉世之事，已於西藏內部尋得靈異幼童兩名，青海塔爾寺方面尋得靈異幼童一名，「依照宗教儀式，應聚集西藏，降鸞掣籤，認定真正達賴之轉世，即多靈異後，復經莊嚴之金本巴瓶內典禮拈定」。電文請國民政府同意尋訪人員將青海幼童送至西藏，參加掣籤典禮。¹⁸

9月24日，國民政府公布了新修正的《喇嘛轉世辦法》，依「向來慣例」

的有意阻攔，其經過情形，參見筆者博士論文，〈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民國政府的西藏特使們，1912-194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第七章。

¹⁵ 行政院為張威白暫行在藏負責准予備案事指令，1938年8月26日，《關係檔案編》，冊7，頁3119。張威白，貴州省遵義人，國民黨中央軍校六期畢業。蔣致余離藏之後，他是國民政府在拉薩的最高官員。中國邊政學會之人員及簡歷，1942年12月，臺灣蒙藏委員會蒙藏文化中心圖書室藏，〈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以下簡稱〈駐藏檔〉），卷42/R3/06/017，「議事紀錄及參加中國邊政學會」。

¹⁶ 行政院為已電青海省府婉勸尋訪人員呈報情況候核事給蒙藏委員會指令，1938年5月1日；吳忠信為詢尋訪轉世達賴進展情形事致馬步芳電，1938年8月12日，《達賴轉世檔》，頁136、139。

¹⁷ 西藏駐京辦事處1931年2月成立，抗戰爆發後，該辦事處和國民政府的其他機構一起遷往重慶。內政部蒙藏委員會為西藏設立駐京平康辦公處及其經費預算事，1930年12月，《關係檔案編》，冊7，頁3095；Thub bstan sangs rgyas, *Rgya nag tu bod kyi sku tshab don gcod skabs dang gnyis tshugs stangs skor gyi lo rgyus thabs bral zur lam zhes bya ba dge'o* [憶述漢地的西藏辦事處]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82), pp. 13, 20-21, 29-32.

¹⁸ 蒙藏委員會致行政院呈，1938年10月8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268-1269；蒙藏委員會為囑報西藏欲聚集靈童之進行情況及其真實意見事致張威白電，1938年10月1日，《達賴轉世檔》，頁143；〈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4。據張威白報告，藏政府在西藏內部選定的兩位靈童一降生於三十九族(Hor sde sum cu so dgu)地方，一降生於山南(Lho ka)，噶廈並派人分別前往迎迓，擬俟三位靈童齊集拉薩後舉行掣籤典禮。但至次年9月，藏政府未經掣籤而確認拉木登珠為達賴轉世，另外兩位靈童事實上並未迎至拉薩。張威白為熱振等偏重青海靈童為化身並擬援例免予掣籤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8年11月13日，《達賴轉世檔》，頁153；華寄天為暫緩譯送兩感電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11月15日，《達賴轉世檔》，頁273；〈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45。

辦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其他高級活佛的轉世事宜，主要包括：達賴喇嘛等活佛圓寂後，需轉報蒙藏會備案；靈異幼童二人以上找到後，需轉報蒙藏會查核；舉行掣籤時，如在西藏境內者，由蒙藏會咨行駐藏辦事長官會同相關人員共同掣定；達賴喇嘛等掣定後，需呈請中央特派大員前往照料坐床。¹⁹

如上所述，國民政府那時並未在西藏設置駐藏辦事長官，無線電工程師張威白以蒙藏會諮議名義，在拉薩暫行代理駐藏事務，不論地位、資望均不足以直接辦理達賴轉世事宜。蒙藏會得到藏政府前述已經選定三位靈童的呈報後，一面請張威白密探西藏當局對此事的真實意圖；²⁰一面擬定派員主持掣籤辦法三項，請行政院鑒核，分別是：一、國民政府特派大員前往拉薩，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二、國民政府特派大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並得由該員指派代表就近辦理；三、國民政府特派蒙藏會委員長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事宜，並得由該委員長指派代表就近辦理。徵諸近年國府護送九世班禪喇嘛(1883-1937)返藏²¹和派遣高長柱入藏受到的阻礙，蒙藏會委員長吳忠信（禮卿，1884-1959）對能否真正特派大員前往拉薩主持達賴掣籤典禮，並無確定不疑的信心，他認為上述三項辦法「於維護體制之中隱寓權變之意」，皆能達到中央實施對藏固有權利的目的。²²行政院會議後決定，先由蒙藏會與藏政府

¹⁹ 蒙藏委員會公布喇嘛轉世辦法，1938年9月24日，國民政府國家總動員會議檔案（一八一）226，《1899-1949年有關西藏問題歷史檔案資料彙編》下，頁30-31。

²⁰ 蒙藏委員會為囑報西藏欲聚集靈童之進行情況及其真實意見事致張威白電，1938年10月1日；蒙藏委員會囑與藏方妥商達賴轉世掣籤辦法事致張威白電，1938年10月25日，《達賴轉世檔》，頁143、149-150。

²¹ 有關九世班禪喇嘛出走內地及返藏經過，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研究專著有Fabienne Jagou, *Le 9e Panchen Lama (1883-1937), Enjeu des Relations Sino-Tibétaine*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2004)。

²² 蒙藏委員會致行政院呈，1938年10月8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270-1274；蒙藏委員會為擬定達賴喇嘛轉世掣籤徵認辦法事致行政院呈，1938年10月8日，《達賴轉世檔》，頁145-146；〈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6。

商洽，視情況再定掣簽辦法。²³

吳忠信安徽合肥人，自述「為國必忠，對友必信」，以此二字為做人做事的原則。²⁴吳氏早年就讀於南京江南武備學校，1906年加入同盟會，民國初年一度擔任首都警察總監，北伐後出任過淞滬警察廳長、安徽省主席、貴州省主席等職。吳忠信和蔣家關係密切，是蔣介石(1887-1975)的忠臣和密友，深得蔣的信任。²⁵1936年8月，他接任黃慕松為蒙藏會委員長。彼時為九世班禪返藏一事，國民政府和拉薩當局關係極為緊張。再者由於蒙藏會藏事處處長羅桑堅贊(Blo bzang rgyal mtshan)為班禪屬下之人，藏政府方面對蒙藏會亦頗為不滿。吳忠信就任委員長後，積極調整與藏政府的關係，調任羅桑堅贊為蒙藏會參事，原參事孔慶宗²⁶則調任為藏事處處長。1937年12月，班禪喇嘛在青海玉樹(sKye rgu mdo)圓寂，國民政府和西藏方面的關係逐漸改善。²⁷

吳忠信決定在拉薩當局同意國民政府人員參加掣簽典禮後，再准予靈童進藏。²⁸但張威白對此有不同看法，擔心這樣做有「留質要盟」之嫌。他說，在未簽定以前，不知誰是真正的達賴轉世，如果青海靈童能中選，確能藉此控制西藏，可是萬一落選，也不過一平凡小兒，所以不如先讓青海省將靈童放行。²⁹吳忠信收到這份報告頗不高興，他責令張威白繼續和噶廈接洽，解釋國府派員參加典禮完全是出於「愛藏之誠」，敦促噶廈接受前述三項辦法之一。他責備道：

²³ 行政院秘書處為達賴轉世掣簽徵認辦法與藏方商洽後再行呈院核定事致蒙藏委員會箋函，1938年10月20日，《達賴轉世檔》，頁148。

²⁴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09-210。

²⁵ 金紹先，〈憶述國民黨元老吳忠信〉，收入文史資料研究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第18輯，頁64-68；《吳忠信先生紀念集》（出版地出版社及年份不詳；臺北：蒙藏委員會蒙藏文化中心圖書室收藏），頁1-8。

²⁶ 孔慶宗1896年生於四川長壽縣，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法院書記官、外交部主事，後調入蒙藏會為參事。孔慶宗致周昆田函，1941年11月27日，〈駐藏檔〉，卷42/R3/06/011，「議事紀錄及參加中國邊政學會」；孔慶宗之中國邊政學會入會表，1942年12月，〈駐藏檔〉，卷42/R3/06/013。

²⁷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1。

²⁸ 吳忠信為青海靈童何時可令赴藏應俟院令遵行事致馬步芳電，1938年10月25日，《達賴轉世檔》，頁151。

²⁹ 張威白為先定掣簽儀式再令靈童赴藏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8年11月20日，《達賴轉世檔》，頁154-156。

達賴轉世，關係中央在藏政權之隆替，……在此時期，如不妥為接洽，期達到中央派員參加掣簽之目的，則主權一失，後患堪虞。且藏人寡信多變，歷次皆然，其初既有不願中央與聞之姿態，恐後更不願中央人員之參加。現如即將青海幼童送往西藏，則將來舉行掣簽時，噶廈不正式呈報，或拒絕中央人員參加，其又將奈何？³⁰

不過，吳忠信對張威白報告中「留質要盟」四字似有所觸動，1938年12月3日，他致電馬步芳，請他對西藏所選幼童待奉到行政院令後再准啓行，但口頭上不妨令紀倉佛等先行準備，「以裕商洽派員之時間，而免留質要盟之口實」。³¹

12月中旬，噶廈來電表示接受三項辦法中之第三項，即由蒙藏會委員長會同熱振主持掣簽事宜，並請指派張威白就近辦理，同時請求將青海幼童早日送達西藏。³²熱振來電亦表示同意國府人員參加掣簽典禮，又稱根據佛示，當年內若不將三位靈童齊迎入藏，於達賴本身有不祥之兆，懇請國民政府飭令青海省府准許紀倉佛帶領靈童即速啓程進藏。³³

藏政府對靈童尋訪經過既已呈報在先，現又接受蒙藏會擬定的掣簽辦法，吳忠信至此感到藏方確有「尊重中央意旨之心」。他請行政院一面轉呈國民政府，明令發表派其會同熱振主持達賴轉世事宜，並得指派代表在拉薩就近參加掣簽徵認典禮；一面電令青海省派員護送紀倉佛及靈童到西藏邊境；同時由國府特給紀倉佛等赴藏旅費5,000元。³⁴1938年12月24日，行政院按吳忠信的

³⁰ 蒙藏委員會令張威白向噶廈解釋掣簽三項辦法真意並促噶廈接受事致張威白電，1938年11月26日，《達賴轉世檔》，頁156-157。

³¹ 吳忠信為待掣簽典禮商妥並奉院令後再准靈童啓行事致馬步芳電，1938年12月3日，《達賴轉世檔》，頁157-158。

³² 西藏辦事處為噶廈接受中央所定達賴轉世掣簽辦法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8年12月18日，《達賴轉世檔》，頁160；蒙藏委員會致行政院呈，1938年12月20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301-1302。

³³ 熱振為中央應當派員參加掣簽典禮事致吳忠信電，1938年12月12日，《達賴轉世檔》，頁158-159。

³⁴ 蒙藏委員會為請國民政府明令特派吳忠信會同熱振主持十四世達賴轉世事致行政院呈，1938年12月20日，《達賴轉世檔》，頁161。

意思向青海省發去電報。³⁵28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事宜。」³⁶

二、青海、西藏和國民政府的三角遊戲

然而事態的發展比人們料想得要複雜。自1939年初開始，蒙藏會迭次電告藏政府，青海馬主席已經同意派員護送靈童入藏。³⁷藏政府則不斷聲稱馬主席根本沒有讓靈童啓程赴藏的意思，請國府立刻電令馬主席放行；此外並請明令張威白就近參加掣籤典禮。³⁸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仔細分析近年解密的漢文檔案，原來西藏、青海和國民政府三方各打各的主意。藏政府需要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馬步芳要錢，並希望利用這次機會從西藏獲取商業利益；重慶的國民政府強調的，則是作為「中央」的威信，以及藉此向世人宣示國民政府對西藏的主權。

馬步芳是回民，信伊斯蘭教。當清朝同治年間(1862-1874)左宗棠(1812-1885)率湘軍平定陝甘回民反清運動時，馬步芳的祖父馬海晏(1826-1900)幫同湘軍鎮壓回民，為馬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後，1912年9月，馬步芳的父親馬麒(1869-1931)被袁世凱政府任命為西寧鎮總兵，由此開始了馬

³⁵ 行政院致馬步芳電，1938年12月24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317。

³⁶ 國民政府特派吳忠信會同熱振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事宜令，1938年12月28日，〈達賴轉世檔〉，頁166。

³⁷ 蒙藏委員會為馬步芳已允派員護送青海靈童入藏事致西藏駐京辦事處代電，1939年1月11日；蒙藏委員會為馬步芳已允護送靈童起程入藏事覆熱振電，1939年1月20日；蒙藏委員會為蔣介石已電令馬步芳速護靈童入藏轉告熱振事致張威白電，1939年2月27日；吳忠信為塔爾寺僧民所稱各節已予駁斥馬步芳已允妥送靈童入藏事覆熱振等電，1939年3月10日，〈達賴轉世檔〉，頁170、173、181、182。

³⁸ 熱振為請催馬步芳放行靈童入藏並接受主持掣籤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1月13日；西藏駐京辦事處為請中央飭令馬步芳速送靈童入藏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1月14日；軍委會辦公廳為轉送西藏駐京代表懇中央派員赴西寧主持護送靈童入藏代電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1月23日；熱振等為馬步芳拖延靈童啓程請中央派員飛青督催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2月27日，〈達賴轉世檔〉，頁171、172、175、180。

步芳家族長達三十七年對青海的統治。1929年，青海省成立，首任省府主席孫連仲(1893-1990)在位不久即去職，馬麒於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為青海省府主席。1931年8月，馬麒病故，遺缺由其弟馬麟(1873-1945)接任。1938年3月，馬步芳正式接替馬麟為青海省府主席。³⁹在談到西北諸馬（寧夏的馬鴻逵和馬鴻賓、青海的馬步芳、甘肅西部的馬步青）的統治時，劉曉原教授指出，和民國時期的其他軍閥不同，諸馬將他們的利益與當地回民的族群認同和歷史記憶結合起來，利用種族的、宗教的以及殘酷的軍事手段，有效地控制著當地事務，將漢族的影響排除於外。蔣介石並非願意承認這些半獨立政權的存在，例如他曾經試圖削弱青海馬步芳家族的勢力，但是沒有成功。另一方面，至少在名義上，馬步芳家族亦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和國民政府為中國的中央政府。⁴⁰由於馬步芳家族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抗戰軍興後，為確保西北地方的穩定和密切注意紅軍在陝甘寧地區的活動，蔣介石需要和馬步芳合作，而馬步芳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和影響力也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⁴¹這在1938到1939年青海、西藏和國民政府三方有關青海靈童赴藏一事的交涉中得到顯著的證明。

如上所述，當1938年初國民政府獲知藏政府在青海找到已故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時，決定在藏政府未呈報尋訪經過以前，防止其將靈童接去西藏。國民政府並在該年5月電達青海省府主席馬步芳，令其對此事「嚴密注意」，「以免意外」。⁴²數月之後，1938年10月23日，馬步芳致電吳忠信稱：「此間蒙藏王公、千百戶及各寺活佛等，以尋獲達賴正身，照依佛教儀式，請求禮拜致敬後，再予起錫赴藏等語。芳以蒙藏信仰所關，禮拜似屬可行。敬以奉聞。」⁴³

³⁹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青海三馬編輯組合編，《青海三馬》（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1-16、46、101。

⁴⁰ Xiaoyuan Liu,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1-115.

⁴¹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Toronto: UBC Press, 2006), pp. 111-112.

⁴² 行政院致馬步芳電，1938年5月1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227-1228。

⁴³ 馬步芳請准靈童先在青禮拜再行入藏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8年10月23日，〈達賴轉世檔〉，頁149。

按馬步芳因是穆斯林，不便親自出面，所以示意地方上的「蒙藏王公、千百戶及各寺活佛等」，要求靈童在赴藏之前接受僧俗大眾的朝拜，即先承認拉木登珠為達賴轉世，然後啓程進藏。馬步芳的這份電報，可以看作是對國民政府前述指令的回應，亦表明他恐怕另有所圖。吳忠信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層，我們不得而知，他的覆電只是說，西藏方面已經呈報尋訪靈童經過，但目前蒙藏會正與藏方商洽掣簽辦法，「西寧選得之幼童，吾兄設法挽留，……何時可令赴藏，應俟院令遵行。」⁴⁴同年12月3日，他再次致電馬步芳，表達同樣意見。不久，藏政府表示接受國府人員參加掣簽典禮。重慶方面隨後即電令馬步芳派人護送靈童進藏，馬步芳的覆電亦稱將遵照辦理。⁴⁵

但是，作為西北地方的大軍閥，馬步芳不一定非得服服貼貼地遵守對日戰爭應接不暇的、偏安重慶的「中央政府」的命令。首先，馬步芳致電藏政府稱，塔爾寺僧民欲將靈童先「就地定妥」，而後照七世達賴之例護送進藏。⁴⁶按，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mtsho, 1708-1757)出生於四川理塘，當時西藏內部發生了蒙古汗王拉藏汗(Lha bzang klu dpal, ?-1717)和第巴(sde pa)桑結嘉措(Sangs rgyas rgya mtsho, 1653-1705)的爭權鬥爭，後桑結嘉措兵敗被殺，他所立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Tshang dbyangs rgya mtsho, 1683-1706)亦被拉藏汗廢黜，後在押送北京途中逝世。拉藏汗另選伊喜嘉措(Ye shes rgya mtsho)為六世達賴，但三大寺⁴⁷不承認伊喜嘉措，而從理塘找到格桑嘉措為倉央嘉措的轉世靈童。1716年，格桑嘉措被青海蒙古僧眾迎到塔爾寺供養，1720年，康熙(1662-1722)令延信帶兵護送格桑嘉措入藏坐床，是為七世達賴喇嘛。⁴⁸從

⁴⁴ 吳忠信為青海靈童何時可令赴藏應俟院令遵行事致馬步芳電，1938年10月25日，《達賴轉世檔》，頁151。

⁴⁵ 行政院致馬步芳電，1938年12月24日；馬步芳致行政院電，1938年12月24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317、1333；吳忠信為護送靈童赴藏事給馬步芳電，1938年12月28日；馬步芳為遵促格倉並護送靈童起程首途日期另告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1月14日，《達賴轉世檔》，頁164、172。

⁴⁶ 熱振等為馬步芳拖延靈童啓程請中央派員飛青督催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2月27日，《達賴轉世檔》，頁180。

⁴⁷ 拉薩藏傳佛教格魯派三大寺，分別是甘丹寺(dGav ldan)、哲蚌寺(vBras spungs)和色拉寺(Se ra)。

⁴⁸ 參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40-44；王森，《西藏佛教發

這段回顧中我們看到，七世達賴由清軍護送進藏的情形與現在完全不同，再者自 1793 年以後，通常情況下，確認達賴轉世需到拉薩進行金瓶掣籤，馬步芳不會不清楚，顯然，他不過藉故遷延，向西藏方面施壓。

1939 年 3 月 5 日，馬步芳召見紀倉佛說：雖然中央已經令他迅速安排靈童入藏，但他為修理塔爾寺金字經典及前輩達賴金塔等費，需款 10 萬元；他的部屬兵餉需款 10 萬元；青海省政府至少需款 10 萬元。以上 30 萬元如能早日交清，他即允許靈童入藏，否則，「中央也需要百姓」。⁴⁹按甘青一帶的習俗，某地出一轉世活佛，寺院方面往往給活佛家庭和地方一筆錢財作為贖金。⁵⁰但是上一年馬步芳已經索取了 10 萬元，這次又強求 30 萬元，這份贖金實在要價太高。西藏駐京代表向吳忠信表示強烈不滿：馬步芳此等行為實在是「陽奉陰違，只圖錢財」，有意阻擋靈童入藏，如此下去，靈童恐有被日人利用之慮。可是吳忠信對蔣介石表示他的意見：「暫不說話，以觀其後」。⁵¹

當時有一些官員建議利用這次機會解決漢藏政治問題，行政院院長孔祥熙(1880-1967)亦傾向於採取積極政策，認為可在達賴未掣籤徵認之前，與藏方交涉派員前往拉薩。但吳忠信擔心操之過急，可能導致藏政府轉請英國出面干涉。1939 年 3 月 7 日，吳忠信呈送孔祥熙密函一件並轉呈軍事委員長蔣介石。

展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214-216。

⁴⁹ 吳忠信致蔣介石呈，1939 年 3 月 17 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以下簡稱〈國民政府檔案〉)，檔號 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 419/2242-2244。據墨凱回憶，除了 30 萬元大洋，馬步芳要求藏政府贈送塔爾寺一套十三世達賴喇嘛用過的僧服和他的寶座上的裝飾品以及一套金汁手寫的《甘珠爾》(bkav vgyur)和《丹珠爾》(bstan vgyur)大藏經(Khemey Sonam Wangdu, "Discover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n Eyewitness Account," in DRE, p. 28)。另有資料稱馬步芳為塔爾寺索求《甘珠爾》，但沒有提到其他物品〔拉烏達熱·土丹旦達遺作，〈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見聞〉，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86)，第 8 輯，頁 11〕。本文據中文檔案。

⁵⁰ 參見張慶有，〈拉卜楞寺活佛轉世資料〉，《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290。後來西藏政府官員回憶此事，亦稱馬步芳提出「鉅額銀圓作為贖金」、以重金「贖買靈童」。參見拉烏達熱·土丹旦達，〈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見聞〉，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8 輯，頁 11-12；拉魯·次旺多吉，〈拉魯家族及本人經歷〉，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第 16 輯，頁 50。

⁵¹ 吳忠信致蔣介石呈，1939 年 3 月 17 日，〈國民政府檔案〉，檔號 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 419/2241-2244。

他說，抗戰期間處理藏事的原則，是徐謀政治之調整及避免與英國外交之磨擦。關於此次達賴轉世，蒙藏會的意思，是待大體辦妥後，再相機與藏方商洽派遣該會高級職員入藏，正式成立駐藏辦事處，辦理新達賴坐床及冊封熱振等事。屆時如環境許可，能由中央特派大員入藏，當更完美。如果在達賴未掣簽徵認之前，即與藏方交涉派員入藏，萬一處理不當，對與英外交或有影響。吳還表示，如果可以派大員入藏，那麼他本人願意赴藏一行。⁵²蔣介石批示：與英磨擦固應避免，但藉護送靈童入藏機會，派員前往監督主持掣簽大典、收回對西藏實權亦為必要，可照孔院長所說的辦理。⁵³

1939年3月28日，吳忠信特約西藏駐京代表午餐，請他們轉告藏政府，中央重視達賴轉世，將派其本人親往拉薩會同熱振主持典禮。⁵⁴次日，蒙藏會藏事處正式函致西藏駐京辦事處：第十四輩達賴轉世，為西藏政教中最重要之事，中央極為重視，本會吳委員長擬親臨拉薩，會同熱振主持此事，並代表中央冊封熱振及授予司倫(srid blon)、噶倫(bkav blon)等勳章，以表示中央尊重西藏政教及慰勞其負責各人員之意。⁵⁵

4月下旬，噶廈回覆表示歡迎吳忠信由海道經印度前往拉薩，「但在未動身以前，務懇中央電知西寧紀倉佛等速送靈兒起程入藏」。⁵⁶未久熱振亦來電，稱青海不遵守中央命令，藉故留難靈童，他請吳忠信到青海，設法和靈童同行入藏。⁵⁷又過一月，靈童行期仍然未定，噶廈亦請吳忠信到西寧帶領靈童一同

⁵² 吳忠信致孔祥熙呈轉呈蔣介石，1939年3月7日，〈國民政府檔〉，檔號 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 419/2260-2263。

⁵³ 吳忠信致孔祥熙呈轉呈蔣介石，1939年3月7日，〈國民政府檔〉，檔號 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 419/2264。

⁵⁴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09。

⁵⁵ 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為擬難提高張威白職位事致西藏駐京辦事處函，1939年3月29日，《達賴轉世檔》，頁 184。

⁵⁶ 西藏駐京辦事處為奉轉噶廈對吳忠信親蒞拉薩極表歡迎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4月23日，《達賴轉世檔》，頁 188。

⁵⁷ 熱振為請吳忠信飛青與靈童同行入藏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4月29日，《達賴轉世檔》，頁 189。

赴藏。⁵⁸

對國民政府來說，此時面臨兩個障礙：一、吳忠信經印度赴藏，需要獲得英印政府方面的簽證；二、馬步芳遲遲不放靈童入藏。第一個問題，行政院已於3月中請駐英大使郭泰祺(1889-1952)向英國外交部交涉辦理。⁵⁹英國堅持須由中方與藏方商妥入藏日期、再由藏政府直接通知印政府洽辦。⁶⁰這樣做隱含承認西藏半獨立地位的危險，國民政府擬待藏方「自動」通知印度後再行辦理。⁶¹第二個問題，在重慶方面的不斷催促下，5月15日，馬步芳覆電稱，已讓靈童摒擋行裝，準備起程。⁶²

然而事實上，青海方面久久仍無動靜。吳忠信明白，只有在青海靈童啓程之後，西藏當局才有可能接受他入藏，得另外設法。當時青海民政廳長郭學禮在重慶，吳忠信請他回青海後向馬步芳說情。⁶³5月末，吳忠信又決定請和馬步芳有很好私人關係的趙守鈺（友琴，1881-1960）前往青海商洽。⁶⁴軍委會方面對馬步芳長期扣留靈童亦非常不滿，認為這樣會使藏方認為中央命令不能施

⁵⁸ 西藏代表為請電催靈童迅速起程入藏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5月29日，《達賴轉世檔》，頁195。

⁵⁹ 孔祥熙為向英國交涉吳忠信假道印度入藏事致郭泰祺電，1939年3月21日，《達賴轉世檔》，頁183。

⁶⁰ 魏道明為吳忠信假道入藏英國答覆須由藏方與印度政府洽辦事致蒙藏委員會函，1939年5月15日；外交部為英國堅持吳忠信假道入藏須西藏直接通知印事致蒙藏委員會公函，1939年6月18日，《達賴轉世檔》，頁192-201；Oriental &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以下簡稱 OIOC〕，L/PS/12/4178，Foreign Office to Dr. Chen Wei-cheng, 9 May, 1939, in A. J. Farrington, ed., *British Intelligence on China in Tibet 1903-1950* (Leiden: IDC, 2002; 以下簡稱 BICT), fiche 495/216.

⁶¹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11；周昆田等為吳忠信入藏人數及護照事致張威白電，1939年8月16日，《達賴轉世檔》，頁231。

⁶² 馬步芳為青海靈童正備裝待發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5月15日，《達賴轉世檔》，頁191。

⁶³ 吳忠信致蔣介石代電，1939年5月18日，〈國民政府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419/2277。

⁶⁴ 吳忠信致蔣介石代電，1939年5月31日，同上，微卷419/2284；吳忠信致孔祥熙呈，1939年5月30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67/1432；行政院為准撥趙守鈺赴青商促靈童入藏旅費事致蒙藏委員會指令，1939年5月31日，《達賴轉世檔》，頁196。趙守鈺，山西太谷人，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陝西省建設廳廳長等職。他和馬步芳的交誼，黃維忠先生稱趙任陝西省建設廳廳長時和馬步芳有聯繫。然其具體情況不詳。參見〈趙守鈺傳略〉，收入《報告書》，頁558-559；黃維忠，《法座下的較量：十四世達賴喇嘛尋訪、認定與坐床紀實》（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頁83。

行於青海，影響中央的「威信」，準備電令馬步芳將靈童送來重慶，再由重慶派人護送靈童入藏。⁶⁵好在到了6月中旬，馬步芳終於明確表示，將於7月初護送靈童赴藏。他說，在青海尋找靈童的費用已由藏方支付清楚，但入藏路費及在藏交際各費仍需10萬元，恭請發給，俾能按期起程，「以副鈞座關注國防之至意」。⁶⁶在蔣介石的直接過問下，10萬元很快由軍需署墊發，撥匯蘭州轉交馬步芳。⁶⁷

三、孔慶宗入藏

1939年6月30日，馬步芳致電吳忠信表示護送費10萬元業已收到，定於7月1日護送靈童赴藏。⁶⁸同一天，吳忠信明令蒙藏會藏事處處長孔慶宗為先遣專員，經由西康先行入藏。⁶⁹原來，考慮到辦理假道印度入藏的護照需要較長時間，吳忠信擔心西藏當局或有可能在青海靈童抵達拉薩之際，即擇期舉行掣簽典禮。為慎重起見，他呈准行政院，特派孔慶宗攜帶茶葉等禮品，取道西康兼程進藏，以期先於青海靈童到達拉薩，吳忠信本人則待護照辦妥後，再由海道經印度前往。⁷⁰

7月2日，孔慶宗從重慶乘坐飛機前往成都，會同科長朱章（字少逸）、服務員吳三立，採辦綢緞等禮品及入藏途中應用之物，7月12日搭汽車抵雅安，會同藏文秘書李國霖，選購茶葉，僱用馱馬，補充物品，7月16日從雅

⁶⁵ 吳忠信致蔣介石代電，陳布雷呈核，蔣介石批示，1939年6月，〈國民政府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419/2285。

⁶⁶ 馬步芳為請發給護送靈童費用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6月15日，〈達賴轉世檔〉，頁200。

⁶⁷ 蔣介石為令軍需署墊發護送靈童所需經費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6月19日，〈達賴轉世檔〉，頁202。

⁶⁸ 馬步芳為收到護送費並告靈童啓程日期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6月30日，〈達賴轉世檔〉，頁209。

⁶⁹ 孔慶宗為報告先遣入藏經過情形致吳忠信呈，1940年4月2日，〈達賴轉世檔〉，頁322。據〈吳忠信日記〉，頁212，則是6月29日發表命令。

⁷⁰ 吳忠信致蔣介石代電，1939年6月21日，〈國民政府檔〉，檔號0592.50/3457.01-01，「達賴轉世案」，微卷419/2318-2319；〈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7-138；〈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12。

安出發，24日抵達康定(Dar rtse mdo)。在此和服務員李桂楠、蘇大成會合，連同勤務5人、廚役1人，共12人，僱用乘馬12匹；另僱馱馬15匹、馱牛142頭馱運物品。8月2日，勤務兩名押運茶葉100馱先行出發，孔慶宗等人整理好行裝，兌換了三萬五千餘元藏銀，8月6日啓程出關，8月13日到道孚(rTavu)，20日抵甘孜(dKar mdzes)，30日抵德格(sDe dge)，在此接金沙江西岸藏軍首領多德(mDo sde)代本(mdav dpon)來信稱，孔慶宗等入藏事，現正派專差向昌都總管(mdo smad spyi khyab)請示，未奉回覆之前，請暫緩渡江西進。⁷¹

這就和蒙藏會先前獲得的信息有所出入了。因為早在7月中，噶廈即已來電對孔慶宗入藏表示歡迎，⁷²張威白亦於8月14日告知噶廈，孔慶宗已從康定出發，請轉知昌都總管準備烏拉(vu lag)馱騎。⁷³看來，重慶方面固然考慮周全，但噶廈亦有噶廈自己的打算。

不清楚出於什麼原因，紀倉佛暨拉木登珠等人入藏日期又拖延了一段時間，1939年7月15日始從塔爾寺動身，馬步芳派馬元海師長率衛兵20名護送，⁷⁴同行的除了拉木登珠的父母親屬外，還有由青海富商馬輔臣率領的甘青朝覲天方團成員。據稱藏政府在青海共用去款項435,000元之多，紀倉佛等人擔心馬步芳得此鉅款後仍有反覆，故與該朝覲團訂有合同，馬輔臣等以朝覲團預備天課及旅費替藏政府墊付了馬步芳要索的322,000元，他們到拉薩後，將由藏政府償還借款，然後經印度前往麥加(Mecca)朝聖。⁷⁵

⁷¹ 孔慶宗致張威白電，1939年7月2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132；吳忠信致孔祥熙代電，1939年7月6日，〈行政院檔〉，檔號0592.50/3457.01-02，「達賴轉世案」，微卷67/1487；孔慶宗致章家麟函，1939年9月2日；吳忠信致張威白電，1939年9月6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03、315；孔慶宗為報告先遣入藏經過情形致吳忠信呈，1940年4月2日，《達賴轉世檔》，頁322-323。按孔慶宗到德格時間，據其事後致吳忠信報告為8月29日，但據當時電報原檔，應是8月30日。

⁷² 噶廈為靈童首途尚未得格倉來電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7月14日，《達賴轉世檔》，頁213；西藏代表為詢靈童起程確期及延誤行期真相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39年7月27日，《達賴轉世檔》，頁217。

⁷³ 張威白致康定蒙藏委員會調查組轉孔慶宗電，1939年8月15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179。

⁷⁴ 馬步芳為派馬元海師長護送靈童入藏事致林森函，1939年6月28日；馬步芳為靈童已啓程沿途情形另報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7月15日，《達賴轉世檔》，頁209、213。

⁷⁵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10月14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69；吳忠信致蔣介石電，

至於馬步芳，因青藏貿易在青海的財政收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⁷⁶在獲取鉅額錢財之外，他亦希望從西藏得到商業利益。因資料欠缺，這方面情況不是太清楚，但是，在靈童一行啓程入藏以前，他與藏政府商定下面兩點，大概屬實：一、爲密切青藏聯繫，藏政府應在西寧設立辦事處；⁷⁷二、此後青海商人入藏有居住營業的自由，藏政府應予招待並減免稅款。1940年8月，馬步芳在西寧設立青藏商務聯合辦事處。次年5月，他派曾任西寧縣縣長的馬峻，以該辦事處經理的名義，前往西藏、印度進行貿易。⁷⁸時值抗戰期間，青海省內物資缺乏，除馬步芳的官辦商號經營青藏貿易外，亦有不少私商向省政府申請赴藏護照，以利貿易；有些商人還經西藏赴印度各地從事貿易，每年返回青海時，運來大批商品，省政府則以十抽一徵收入口稅。⁷⁹

話說回來，拉木登珠等人啓程一個月後，1939年8月中旬，張威白獲得消息：雖然不無閑言，熱振仍有不欲掣簽、直接認定拉木登珠爲達賴轉世之意。⁸⁰8月底他又報告說，西藏全體僧俗官員於26、27兩日（藏曆七月十、十一日）齊集布達拉宮，由大仲譯(drung yig chen mo)洞波(Don po mKhyen rab dbang

1939年10月16日，〈國民政府檔〉，檔號0592.50/3457.01-02，「達賴轉世案」，微卷420/0080；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致外交部函，1940年7月22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以下簡稱〈外交部檔〉），檔號172-1/0010/019/42，「派員入藏事案」；Khemey Sonam Wangdu, "Discover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n Eyewitness Account," in DRE, pp. 30-35。據吳忠信到拉薩後瞭解到的情況，藏政府交還馬輔臣的款項是大洋329,000元，折合盧比260,000餘元（參見吳忠信爲請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簽頒發坐床經費事致趙丕廉電，1940年1月28日，《達賴轉世檔》，頁288）。本文據馬步芳致黃朝琴轉報馬輔臣呈文的電報。

⁷⁶ 據研究，青海的羊毛有相當一部份經西藏出口；另外抗戰爆發後，馬步芳還通過西藏與英國進行軍火交易。扎洛，〈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候送拉木登珠1938-1939年間滯留西寧問題探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卷25期2（2004年3月），頁32-33。

⁷⁷ 不過，後來青海靈童已迎至拉薩，藏政府任命的官員便沒有去西寧就任。拉烏達熱·土丹旦達遺作，〈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見聞〉，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頁11-12。

⁷⁸ 韓永鵬遺稿，〈馬步芳派我赴西藏黑河解圍和掠奪物資的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青海文史資料選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64），第3輯，頁132-133。

⁷⁹ 莫如志，〈馬步芳經營「協和商棧」的內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青海文史資料選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85），第14輯，頁177。

⁸⁰ 張威白論十四世達賴金瓶掣簽之損益致吳忠信電，1939年8月16日，《達賴轉世檔》，頁231。

phyug, 1897-1959)宣讀紀倉佛在青海尋訪靈童經過，宣稱拉木登珠確係達賴轉世，無須金瓶掣籤。如眾人對此有所懷疑，可在大會當眾發表，如果以後察覺有流言蜚語，當即削職、抄家、徒流。結果無人發表異議。大會並決定派噶倫彭雪(Bon shod Tshe brtan rdo rje)、大仲譯洞波率僧俗官員到黑河(Nag chu)迎候拉木登珠一行。張威白分析藏政府此舉的主要原因，是在朝者附和熱振、保全自己的官職，使在野失勢者無另擁靈童、攫取政權之野心；而避免中央大員監視掣籤，不過是附帶問題。他指出當前的情況，如果中央堅持必須經金瓶簽定達賴轉世，則拉木登珠可能落選；如果同意不掣籤而認定，則是自動放棄權利。張威白權衡利害，建議可在吳忠信抵藏之時，會同熱振將拉木登珠特異之點呈報中央核准後，迎之於羅布林卡(Nor bu gling kha)，舉行就位典禮，如此方不喪失主權。⁸¹

不論西藏方面出於什麼原因，對國民政府而言，最要緊的是它的高級官員早日到達拉薩。吳忠信的經印護照仍未辦成，看來只能指望孔慶宗兼程前進。然而他被阻在金沙江東岸，插翅難逾。

沒過多久，多德代本告訴孔慶宗，昌都總管沒有接到噶廈歡迎他入藏的命令。1939年9月8日，吳忠信讓張威白轉電熱振及噶廈，請再令昌都總管接送孔慶宗一行。⁸²張威白當天即拿著電報到噶廈，噶倫彭雪跟他說，噶廈早已函知昌都，應該不會貽誤，可能是孔慶宗一行人數與原定數目不符。張威白強調並無人數不符之事，請噶廈再派專差飛遞公函，讓昌都放行。⁸³

⁸¹ 張威白為藏中對各靈童反應並盼吳忠信早日到藏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8月26日；張威白為西藏當局連日會議商討認定青海靈童等情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8月28日，《達賴轉世檔》，頁236-237、237-238。在尋找已故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過程中，司倫朗頓(Giang mdun Kun dgav dbang phyug)支持他的外甥、宇妥(g-Yu thog)的孩子為靈童候選人，而熱振把找到青海靈童看成他執政以來的最大成就，他感到司倫正在企圖將宇妥之子認定為達賴轉世，阻撓青海靈童尋訪工作的順利進行，故於1939年4、5月間用計謀除去朗頓的司倫職務。張威白所謂使失勢者無另擁靈童、攫取政權之野心的話，大概是針對這件事說的。參見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333-337。

⁸² 吳忠信致張威白電，1939年9月8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04。

⁸³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10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22。

9月12日，噶廈電告吳忠信，業已補發歡迎孔慶宗的命令。⁸⁴同一天，張威白聽說拉木登珠一行已於藏曆七月二十一日（西曆9月4日左右）到達哲曲卡（Zla chu kha，今青海玉樹扎曲河流域某處），中秋前後可到拉薩。⁸⁵14日，張威白又探得消息，噶倫彭雪、大仲譚洞波及其他僧俗官員已於當天清晨前往黑河迎候。據張威白當天和熱振的密談，靈童行期如下：9月17日到黑河；21日從黑河動身，26日到熱振寺；10月2日自熱振寺動身，7日抵拉薩，駐羅布林卡；12月舉行削髮典禮；次春舉行坐床大典。熱振還告訴他，以上為一定不易之期。但是，張威白仍然擔心熱振為對付異己而將坐床典禮提前，他急切盼望吳忠信早日赴藏。⁸⁶

在熱振的提議下，9月22日，張威白前往熱振寺歡迎靈童。據他調查，向例新達賴到拉薩，清朝欽差駐藏大臣會到距拉薩一日路程的地方歡迎，熱振曾跟他談道：此次新達賴來自漢方，駐藏漢官前往遠迎，更屬親上加親。⁸⁷

拉木登珠即將行抵拉薩，孔慶宗仍然無法進藏。據說9月上旬噶廈曾有專差到昌都，其中並未提及國府人員赴藏之事。吳忠信希望張威白繼續和熱振、噶廈商洽此事。⁸⁸這份電報到達拉薩的時候，張威白已經到熱振寺迎接靈童去了，他就任駐藏諮議後選任的秘書華寄天代理其職。⁸⁹華寄天告訴吳忠信，噶廈專差在9月10日發出，需要十二、三天才能到昌都，孔慶宗日內當可渡江，請再稍候數日。⁹⁰

孔慶宗相信他久久不得渡江是昌都方面有意延阻，⁹¹他向多德代本及昌都

⁸⁴ 噶廈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12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25。

⁸⁵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12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24。

⁸⁶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14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28；吳忠信致蔣介石電，1939年9月18日，〈國民政府檔〉，檔號0592.50/3457.01-02，「達賴轉世案」，微卷420/0062-0063。

⁸⁷ 華寄天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22日；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15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32、240。

⁸⁸ 吳忠信致張威白電，1939年9月18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11。

⁸⁹ 吳忠信致張威白電，1938年11月2日；吳忠信致華寄天電，1939年9月18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82、214。

⁹⁰ 華寄天致吳忠信電，1939年9月22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42。

⁹¹ 孔慶宗致張威白電，1939年9月30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46。

總管表示，他是在收到噶廈歡迎他入藏的電報後才出發的，而且隨從人員簡單，所攜帶的不過茶葉等禮品，並無衛隊槍枝，噶廈公文應該早已到達，昌都方面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⁹²他的解釋不起作用，昌都總管堅持必須等待拉薩的命令。

1939年9月17日清晨，初升的太陽映紅了靚藍的天空，拉木登珠一行到達距黑河北部十里地左右的一個牧場，從拉薩趕來迎接的噶倫彭雪宣布拉木登珠即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真正轉世。⁹³10月2日，拉木登珠一行從熱振寺動身前往拉薩，同一天，昌都總管終於表示已接到拉薩的命令，派人到德格歡迎孔慶宗進藏。10月4日，孔慶宗一行渡過金沙江，14日抵達昌都。⁹⁴那時拉木登珠到拉薩已有多日了。據稱，在他進入拉薩城的時候，遠道前來瞻禮者逾數萬人。他立刻被藏政府安置到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接受官民公開朝拜，儼然一位小達賴。⁹⁵只是由於爲他用款過鉅，西藏上下不論官吏還是普通百姓都公開議論：達賴轉世係西藏用錢買來。⁹⁶

1939年11月中，拉薩傳聞達賴轉世靈童的坐床典禮將於次年即藏曆鐵龍年正月十四日（1940年2月22日）舉行，當年藏曆十月十三日則爲靈童削髮受戒之期。在國民政府的官員看來，雖然據清朝舊例，削髮儀式對坐床大典關係不大，但有中央大員在場當然更好。⁹⁷可是孔慶宗仍然彳亍在昌都至拉薩途

⁹² 孔慶宗致慰蒼函，1939年9月11日；孔慶宗致多德代本函，1939年9月19日；孔慶宗致昌都札薩函，1939年9月29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318、328-329、330-333。

⁹³ Bstan vdzin rgya mtsho, *Dalai Lama XIV,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Auto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p.16; B. J. Gould,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pp. 550-551; B. J. Gould,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p. 212.

⁹⁴ 孔慶宗致張威白電，1939年10月3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45；孔慶宗爲報告先遣入藏經過情形致吳忠信呈，1940年4月2日，《達賴轉世檔》，頁323。

⁹⁵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使藏紀程、拉薩見聞記、西藏紀要三種合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以下簡稱《三種合刊》），頁22-23；B. J. Gould,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pp. 213-215.

⁹⁶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9年10月14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69。

⁹⁷ 華寄天致趙丕廉電，1939年11月15和18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84、287。

中，由於雨雪，烏拉不齊以及隨行人員患病，他的行期不得不再次延誤。⁹⁸11月21日（藏曆十月初九），熱振電告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擇定於藏曆十月十三日為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削髮，坐床大典於明年正月十四日舉行。⁹⁹同一天，孔慶宗行抵墨竹工卡(Mal gro gung dkar)，那裏距拉薩只剩下160里路程了，他告訴華寄天，自己將於11月23日到拉薩，華寄天隨即告知藏政府，在舉行靈童削髮儀式時，為孔慶宗準備座位，然後帶領熱振、噶廈及尼泊爾等代表前往德慶(bDe chen)迎接孔慶宗一行。因烏拉不齊，孔慶宗在墨竹工卡又耽擱了一天。¹⁰⁰不過他還是設法在11月25日上午渡過拉薩河，如果正常換算，那天正是藏曆十月十三日。翹首西矚，布達拉宮灼爍在望，當天中午，孔慶宗一行抵達拉薩。出人意料的是，早一天，即11月24日，藏政府已在大昭寺(Lha ldan gtsug lag khang)為拉木登珠削髮剃度，取法號為吉尊強白阿旺益喜丹增嘉措(rJe btsun vjam dpal ngag dbang blo bzang ye shes bstan vdzin rgya mtsho，簡稱丹增嘉措)。孔慶宗最終沒能趕及參加這一儀式。¹⁰¹

四、水路來的「安班」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大典

關於吳忠信假道印度入藏的簽證問題，前述英國堅持必須先由中方與藏方商妥入藏日期、再由藏方直接通知印政府對吳表示歡迎，英國才能辦理。由於這牽涉到主權問題，國民政府決定設法讓藏方「自動」通知英國。可是，藏政

⁹⁸ 華寄天致趙丕廉電，1939年11月18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87；孔慶宗為報告先遣入藏經過情形致吳忠信呈，1940年4月2日，《達賴轉世檔》，頁323。

⁹⁹ 熱振致林森電，1939年11月21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89。

¹⁰⁰ 孔慶宗致華寄天電，1939年11月21日；華寄天致趙丕廉電，1939年11月21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90、343；孔慶宗為報告先遣入藏經過情形致吳忠信呈，1940年4月2日，《達賴轉世檔》，頁323；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4。

¹⁰¹ 孔慶宗為報安抵拉薩謁見熱振等情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11月26日，《達賴轉世檔》，頁275-276；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5；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 285。據熱振11月21日（藏曆十月初九）致林森電報的日期推算，藏曆十月十三日應是11月25日。不過，為趨吉避禍，藏曆往往有兩個相同的日期，以此避免另一個不吉的日子出現。十四世達賴喇嘛削髮的日期最後是西曆11月24日，可能即出於這個原因。熱振告訴了國民政府靈童受戒的藏曆日期，但他沒有指出相應的西曆日期。

府雖然於 4 月下旬即向重慶表示歡迎吳忠信經海道入藏，卻一直沒有「自動」將此事通知英國。

1939 年 6 月底，藏政府請吳忠信在青海靈童動身後決定行期，以便與印度方面辦理有關手續。¹⁰²7 月 23 日，青海靈童啓程不久，吳忠信將行期告知西藏駐京辦事處，請其轉電噶廈：9 月自重慶首途，11 月經過印度入藏。¹⁰³8 月中再度說明同行入藏人數和行期。¹⁰⁴他不便主動提請藏政府告知印度歡迎其入藏，只能等待對方的「自動」。可是藏政府遲遲沒有確切表示。8 月 20 日，噶廈來電對吳忠信再表歡迎，同時提醒他不要多帶隨員，但對經印簽證一層仍然隻字未提。¹⁰⁵國民政府爲此著急可以想見，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甚至親自致函外交部長王寵惠（亮疇，1881-1958），請他儘早辦妥吳忠信入藏護照。¹⁰⁶蒙藏會一面又請拉薩的張威白「善爲運用」，催促藏方早日通知印度，以便吳忠信如期赴藏。¹⁰⁷這樣一直到了 1939 年 9 月 1 日，熱振終於來電稱，吳委員長及隨員僕役取道印度入藏一事，業已通知印政府「沿途妥爲關照矣」。¹⁰⁸

10 月 1 日，蒙藏會委員長行轅成立，在重慶新村 5 號辦公。¹⁰⁹入藏禮品、經費等事已在購置辦理之中。10 月 5 日，外交部將護照辦妥，吳忠信入藏之必備手續至此終於得到解決。¹¹⁰10 月 21 日，吳忠信搭乘飛機赴香港，在港爲

¹⁰² 蒙藏委員會公函，1939 年 7 月 10 日，〈外交部檔〉，檔號 172-1/0010/019/42，「派員入藏事案」。

¹⁰³ 吳忠信爲取道印度入藏日期事致西藏駐京辦事處代電，1939 年 7 月 23 日，〈達賴轉世檔〉，頁 216。

¹⁰⁴ 吳忠信爲入藏隨員人數及啓程經印日期事致熱振及噶廈電，1939 年 8 月 11 日，〈達賴轉世檔〉，頁 230。

¹⁰⁵ 噶廈爲請勿多帶隨行人員入藏事致吳忠信電，1939 年 8 月 20 日，〈達賴轉世檔〉，頁 233-234。

¹⁰⁶ 蔣介石致外交部箋函，1939 年 8 月 15 日，〈外交部檔〉，檔號 172-1/0010/019/42，「派員入藏事案」。

¹⁰⁷ 熊耀文等爲請促噶廈早日通知印度俾如期成行事致張威白電，1939 年 8 月 23 日，〈達賴轉世檔〉，頁 235。

¹⁰⁸ 熱振爲已告印度沿途關照事致吳忠信電，1939 年 9 月 1 日，〈達賴轉世檔〉，頁 238。

¹⁰⁹ 吳忠信爲成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開始辦公事通告，1939 年 9 月 28 日，〈達賴轉世檔〉，頁 248。

¹¹⁰ 吳忠信爲領到護照並定十月中旬啓程事致孔祥熙函，1939 年 10 月 5 日，〈達賴轉世檔〉，頁 252；〈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39；〈吳

籌備禮品等物逗留了一月，11月23日飛抵緬甸仰光(Rangoon)，會齊其他隨員，11月27日飛抵加爾各答(Calcutta)，¹¹¹在此為洽運行李及配備旅途應用物品停留了十日。期間吳忠信曾接見護送拉木登珠一行入藏的馬元海師長、馬輔臣及其率領的甘青朝覲天方團，朝覲團約有男女四十人，其中並有三位是八十歲高齡的老翁，他們將經此前往麥加朝聖。¹¹²

從加爾各答北行取道錫金進藏，必須經過大吉嶺(Darjeeling)或者噶倫堡(Kalimpong)，兩地都是由印入藏的門戶。吳忠信一行將由噶倫堡前行，隨員還在辦理行李運輸等事，吳忠信決定去參觀大吉嶺。1939年12月6日晚，他在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1897-1972)陪同下，乘火車離開加爾各答；次日晨到西里古里(Siliguli)，從這裏換乘汽車，約行兩小時，抵達大吉嶺。他下榻的旅社房間北窗正對著喜馬拉雅山第二高峰，雪嶺在望，潔白長空，極目無際。他過去即主張對西南國防應從西藏入手，此次到大吉嶺後更感到，必須控制喜馬拉雅山，方可左右亞洲。¹¹³

1939年12月13日，吳忠信由大吉嶺轉赴噶倫堡，19日到錫金首都岡多(即甘托克，Gangtok)，下榻英國駐錫金行政長官古德家中，兩人暢談國際大勢，只是未涉及西藏問題。¹¹⁴20日，吳忠信一行共19人離岡多北進，此後越行地勢越高，山路越加險峻。23日到亞東(Gro mo，今下亞東)，藏政府所派三位乃興巴(sne shan，接待員)已在此等候。1940年1月3日，吳忠信一行抵達江孜(rGyal rtse)，1月15日晨，他們從距拉薩最後一站的業當啓行前進，吳忠信的秘書周昆田當日致中央通訊社的電報是這樣寫的：

吳委員長禮卿先生奉派赴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轉世事宜，其先遣專員

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18-220。

¹¹¹ 吳忠信為告由渝啓程赴藏日期事給張威白電，1939年10月21日，《達賴轉世檔》，頁260；〈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9；〈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21-227。

¹¹²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27-228。

¹¹³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29-231。

¹¹⁴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32-234。

孔慶宗早於上年十一月杪抵拉薩，吳委員長本人暨其秘書長羅良鑿，顧問曹經沅、奚倫，秘書周昆田、張國書等一行十餘人，亦於今日到達。熱振佛代表札薩(dza sag)戈布暨噶倫丹巴嘉樣(bsTan pa vjam dbyangs, 1888-1944)、彭休(即彭雪)、彭康(Phun khang bKra shis rdo rje, 1888-?)以及藏中高級僧俗官吏七十餘人，於郊外十餘里哲蚌寺附近設帳歡迎，儀式隆重。入藏川、滇、北平、新疆商民，與夫英人發克司(Reginald Fox)及尼泊爾代表等，亦均分別遠迎。所有駐拉薩藏軍七百餘名，全體出城列隊迎候於十里外之道旁。嗣即由藏軍與各歡迎人員為前導，吳委員長乘大轎，餘員乘馬，於午後四時許相繼進城。城內鳴禮炮二十七響，以示敬意。隊形整肅，衣冠濟濟，極一時之盛。沿途民眾觀者如堵，熱烈景況為藏中歷史上所僅見。此次藏政府所派招待人員，除卓木總管(gro mo spyi khyab)沿途隨侍外，在拉薩者有霞札(bShad sgra dGav ldan dpal vbyor, 1922-1969)、詹東(bKras mthong bSod nams rdo rje, 1923-?)及吞巴(Thon pa Byams pa mkhas grub)三世家公子，尤為空前創舉。吳委員長下榻於預為佈置之行轅內，當日即先後接見丹巴嘉樣、彭休、彭康三噶倫及其他高級官吏。擬明日休息一日後，即朝大招寺，並與熱振佛晤敘云。¹¹⁵

吳忠信曾談及他此行入藏之目的，在於「樹立信用、收拾人心」，「以增進大中華民族之團結」。¹¹⁶他認識到僧侶在西藏有操縱輿論、左右政治的作用，

¹¹⁵ 周昆田為吳忠信抵拉薩並受到熱振歡迎情形事致中央通訊社等電，1940年1月15日，《達賴轉世檔》，頁280-281。參見〈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42；〈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43；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37-45；夏扎·甘登班久，〈憶吳忠信來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片段〉，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84），輯2，頁41-42。通常情況下，西藏政府有四位噶倫，但吳忠信停留拉薩期間只提到三位。據朱少逸稱，朗瓊(sNang byung sPen pa don grub)噶倫最近調駐昌都，雖未啓行，但已不到噶廈辦公。見其著頁31-32。

¹¹⁶ 吳忠信為擬具入藏任務與組織暨經費意見事致行政院摺呈，1939年8月4日，《達賴轉世檔》，頁219-220；〈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32。

故自進入藏境，凡遇寺院均予佈施。抵達拉薩後，對三大寺更是禮遇有加，佈施數量優於他寺。其次，他入藏前派人從香港、上海、成都各地購買了三百餘駄禮品，包括杭綢、庫緞、湘繡、川茶、景泰藍等物，抵藏後對僧俗六品官以上廣泛贈送，其中送予達賴喇嘛的禮物有 30 種之多，共八百餘件，均為上等珍品國貨，僱用 80 人抬往布達拉宮。另外，吳忠信特聘留德醫學博士單問樞同往，抵達拉薩後廣為施診施藥，遠近藏人前來就診者，日以百計，貴族中如噶倫彭康夫婦等亦紛來就醫，特別是單醫生治好著名高僧東本格西(sTong dpon dge bshes)的水腫，給藏人留下了很好印象。¹¹⁷

吳忠信的主要任務是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掣籤坐床典禮，然而如上所述，在他抵藏之前，西藏當局已經確認拉木登珠為達賴轉世，這金瓶掣籤一項便無法舉行了。事實既已如此，吳忠信亦只好承認，不過他強調必須具備應有的程序。

首先，吳忠信認為，根據過去的達賴喇嘛轉世手續，可以不經掣籤直接徵認，但必須呈請中央核定。吳忠信甫抵拉薩即派張威白和熱振接洽此事。1940 年 1 月 26 日，熱振送來函件，內述拉木登珠種種靈異，請免予掣籤。可是此函甚至不具備基本的形式，沒有抬頭也沒有落款人。吳忠信「閱之大詫」，「嚴詞告來使云，似此毫無誠意，顯係侮辱本人」。他當即讓張威白拿去補具公函首尾，並加蓋熱振印章。¹¹⁸

其次，吳忠信要求在接到熱振請免掣籤的報告後，親自訪晤靈童，面加考察，然後轉呈中央。熱振對此亦表示接受，但是當吳忠信派人前往羅布林卡商談時，在見面形式上發生了分歧。總堪布(spyi khyab mkhan po)阿旺丹增(Ngag dbang bstan vdzin)堅持表示，根據民眾大會決議，無論何人往見靈童均須殿見。吳忠信認為，以民眾大會之決議限制中央大員，已屬無理，即照舊制論，

¹¹⁷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2-143；〈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69-270、286；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 95。

¹¹⁸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5；〈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47。

欽差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本屬平行，何況其為未經登座之靈童？他決定中止往訪靈童。後經多次磋商，藏方始同意在羅布林卡便見。¹¹⁹

1940年1月31日早上，晴空如洗，微風拂人，吳忠信偕張威白、朱章等人前往羅布林卡。見面地點設在荷池當中的一個花亭內，吳忠信抵達之時，靈童已經就坐主位，吳忠信試與談話約十餘分鐘，靈童報以微笑，似有領會。吳忠信復向總堪布略詢靈童起居，後出至亭外，與靈童並坐，請攝影師共攝一影，以留紀念。他感歎道：靈童時齡僅四歲餘，而舉止行動極為沉著安閒，「聰穎如此，殊屬難得」。¹²⁰

坐床典禮定於2月22日在布達拉宮舉行，期間發生了座位問題。起初藏政府想讓吳忠信和司倫或熱振相向對坐，吳忠信以本人此行代表國府主席，又係主管蒙藏事務之長官，體制攸關，拒不接受。他堅持至少應照清朝駐藏大臣之例設座，即於達賴平行之左方，設面南之座，幾經折衝，藏方同意照辦。¹²¹

坐床典禮將於2月22日早上5時半開始。那一天，行轅全體職員於4時前後用膳，4時半，吳忠信派孔慶宗先去布達拉宮視察。吳本人率其他職員於5時餘到達，過約半小時，達賴入殿就位，吳忠信與達賴面南而坐，行轅職員、尼泊爾代表等坐東面西，熱振、司倫、各呼圖克圖坐西面東，噶倫、札薩等坐大殿南部面北。坐定後，熱振、噶倫分別起立對達賴行叩首禮，然後熱振立大殿的中央，高聲誦經並宣讀疏文約十餘分鐘，一堪布將一幅錦製金剛多爾濟圖掛達賴座上，寓長壽不變之意；另一堪布以尖頂黃帽加其頂上。然後，熱振、吳忠信、司倫、噶倫等分別向達賴獻哈達，期間復有辯經。獻禮完畢，辯經亦

¹¹⁹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49；〈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48；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60-61。

¹²⁰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49；〈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50；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61-63。

¹²¹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49；〈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62、265-267；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77。

終止。其後還有舞蹈、獻茶等禮。最後為搶麵餅，就是僕役、平民數十人入殿爭搶麵餅等食物，搶盡散去，象徵吉祥，典禮亦於此時結束。此次坐床大典，國民政府特別撥給坐床費 40 萬元。¹²²

冊封熱振及授勳噶倫的典禮亦已於 2 月 15 日舉行。¹²³入藏任務至此基本完成，期間雖稍有不快，結果總算圓滿。吳忠信自認此行已經體現了國民政府對西藏主權 / 統治權的行使，不禁感到十分快慰。¹²⁴

五、成立駐藏辦事處與聯絡藏中政要

因時當抗戰，吳忠信入藏之前即決定不提政治問題。¹²⁵但他還是略為試探了一下藏政府的態度。3 月 8 日，吳忠信在行署宴請三位噶倫和總堪布，席間提及：（一）劉樸忱墓地需要擴充，並建紀念堂；（二）青、康、滇三省與藏境毗連，應恢復官商人民交通；（三）西藏派送學生到中央軍官及中央政治學校學習；（四）班禪靈柩應設法護送回藏。噶倫回答：劉墓擴充，只要兩邊留路，可以照辦；學習問題，無適當學生可以選派；其餘則未有確切表示。¹²⁶數日之後，吳忠信復將以上諸事以書面形式派人向噶廈商洽，¹²⁷然而遲遲沒有答覆。3 月 31 日，吳忠信派孔慶宗和張威白前往熱振處，告以吳忠信離藏日期，順便詢問以上事項。據稱熱振的答語「極為可異」，略謂：交通問題已經迭經商討，大眾不免有所懷疑，交通暢達之後，漢人源源而來，愈積愈眾，西藏何

¹²²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8-151；〈吳忠信入藏日記〉，同上，頁 267-268。

¹²³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4；〈吳忠信入藏日記〉，同上，頁 262-263。

¹²⁴ 吳忠信為在藏各事均甚圓滿對藏主權業已恢復事致衛立煌電，1940 年 3 月 1 日，《達賴轉世檔》，頁 318；〈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32；〈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313。

¹²⁵ 吳忠信為擬具入藏任務與組織暨經費意見事致行政院折呈，1939 年 8 月 4 日，《達賴轉世檔》，頁 220。

¹²⁶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77。

¹²⁷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52；〈吳忠信入藏日記〉，同上，頁 280-281。

以善後？目前青、康、滇、平等處商人每年仍有通行者，今吳委員長所提恢復交通之意，廣泛難明，僉謂恐有政治意味。當前西藏形勢複雜，一般看法，以為含蓄的說法，西藏係自治，坦白說則是獨立國。前清壓迫西藏，直至軍事衝突，可見藏人之意志。現僧俗官員中實有不少傾向英國者，望中央對藏事最好緩和，求其進步。交通問題總有好好解決之希望，但是否悉如吳委員長之意見，或者間有出入，須俟商定後才能明白答覆。¹²⁸

4月2日，噶廈在迭次會議商討並降神打卦之後，送來覆函，函文對班禪靈樞回藏一事表示同意，對朝山禮佛及商務來往人員亦表歡迎，此外寫道：

西藏係宗教政治並施之國，專以振興佛教以及全球眾生得獲安樂為主要，以是政府應有入款，概為宗教上應用之費，雖蒙中央為漢藏施主之誼，予以和平，然邊界官員數人不遵中央命令，破壞漢藏和平，屢次衝突，一向已將藏土德格、夥科(Hor khog，今四川省道孚、爐霍、甘孜一帶)、瞻對(Nya rong，今四川新龍縣)等處奪占，至今尚未退還，竟將藏方奉佛之資取為己有。……漢藏中往來不便者，皆因邊境不平之所致，請將藏土德格、夥科、瞻對等地歸還藏方，並由中央嚴飭各邊界不得照前滋事，俾得邊地平靜，則西藏人眾心信意服，漢藏和平較前尤進。¹²⁹

吳忠信閱畢此函，大為詫異，看到西藏以獨立國自居，簡直是「夜郎自大」，「太不自量」。對於交通問題，這份覆函涉及界務，亦越出了討論範圍。他決定除了派人向噶廈說明其觀點的不當之處，不再繼續商談。¹³⁰

吳忠信此行在政治上還是有所突破，就是成立了蒙藏會駐藏辦事處。行政院曾有意成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但在與熱振商討時，熱振表示，「英國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正密切注意中藏政治問題，不無顧慮」；再者此等大事如果提

¹²⁸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91-293。

¹²⁹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52-153。

¹³⁰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53；〈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94。

出，必定先交民眾大會解決，預計萬難通過，反增誤會。¹³¹幾經考慮，吳忠信決定成立蒙藏會駐藏辦事處，又因擔心將遭到藏政府拒絕，故成立之先並未和藏政府商洽。3月25日，吳忠信發表蒙藏會駐藏辦事處正副處長委任令，孔慶宗為處長，張威白為副處長，限於4月1日籌備成立，同時分函熱振及噶廈查照。¹³²

按錫金行政長官古德是於1940年2月5日率領使團來到拉薩的。因為希望西藏成為印度和俄國、中國之間的一個「緩衝區」(buffer state)，英國一向既不支持西藏獨立，又不願承認中國對西藏具有實際主權。¹³³古德此行名為慶賀達賴喇嘛坐床，實則帶有刺探吳忠信在拉薩的活動和藏政府對吳忠信態度的目的。¹³⁴不過在拉薩期間，藏政府對古德的接待規格不如吳忠信，而且因為不便同時安排吳忠信和古德在達賴喇嘛坐床大典上的座位，藏政府暗示古德不參加，而於次日前往布達拉宮呈送禮物。¹³⁵

1940年4月14日，吳忠信啓程東返，他在當天的日記中總結拉薩三個月的收穫：1. 熱振於1月26日具文報告尋訪拉木登珠經過，請免以掣簽，經他轉呈國府核准，「此一篇洋洋萬言之藏文呈文，自應成為我國家對於中藏關係

¹³¹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54-155；〈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77-279。

¹³²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155，〈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86。

¹³³ 有關英國對藏政策，參見下列著作：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Roxford Books, 1989);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7); Wendy Palac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1922*.

¹³⁴ OIOC, L/PS/12/4178, B. J. 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5 September, 1939, BICT, fiche 496/305-306;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1 February, 1940, BICT, fiche 496/366；〈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78-279、292。

¹³⁵ OIOC, L/PS/12/4178, B. J. Gould to Foreign Office, 8 and 14 March, 1940, BICT, fiche 496/385-386, 388; Foreign Office to B. J. Gould, 11 March, 1940, BICT, fiche 496/387; B. J. Gould,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pp. 556, 562, 571;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pp. 325-326.

中之重要文獻」。2. 舉行坐床典禮時，「英國代表古德以無適當座位，迄未願出席，而藏政府亦聽任其不參加。此純為我國本身之事，與英方無涉。此禮成後，西姆那條約已於無形中被撕毀矣。」¹³⁶

從吳忠信的入藏日記來看，他此行最顯著的事蹟之一是會見了一大批西藏僧俗官員及其他重要社會人物，甚至包括所謂「親英分子」，如前藏軍總司令札薩擦絨(Tsha rong Zla bzang dgra vdul, 1886-1959)，三十九族總管(Hor spyi khyab)瓊讓(Khyung ram)，以及已經去職的前噶倫澤墨和司倫朗頓等人。¹³⁷因為吳忠信認為，親英分子「對中國亦有相當情感，默化潛移，要非無術，是在隨時隨地因勢利導」；¹³⁸至於一時失勢之輩，「雖暫時不管政事，將來必有東山再起之日」。¹³⁹吳忠信清楚在沒有足夠實力為後盾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解決西藏問題的，他在入藏前致行政院呈文中談到：「經邊固不可無相當兵力以為輔翼，但在抗戰時期，則宜以政治運用為先務。」具體辦法：外交上避免與英國發生磨擦；政治上扶持熱振，使親漢派漸握實權，同時聯絡親英、自立兩派，減少對中央的反感；宗教方面，通過熬茶、佈施等佛事活動聯絡三大寺及各寺院；對於一般民眾，要善用宣傳和實施德惠。¹⁴⁰蔣介石亦指示吳忠信，到藏後對熱振及其他要人「一律優加聯絡，切實結納，並對有實力之人物相機允許予以扶助。」¹⁴¹吳忠信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他曾多次示意熱振，國府支持他

¹³⁶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99-300。

¹³⁷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1-142；〈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40、252-253、260、279、299。擦絨曾隨十三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並於民初指揮藏軍驅逐清朝駐軍出境，因而被視為親英分子，其生平，參見 Dundul Namgyal Tsarong,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0)；瓊讓曾十多年以代本身分駐紮西藏東部，多次率領藏軍打敗川康駐軍。

¹³⁸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59。

¹³⁹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99。

¹⁴⁰ 吳忠信為擬具入藏任務與組織暨經費意見事致行政院摺呈，1939年8月4日，《達賴轉世檔》，頁 228。

¹⁴¹ 蔣介石為到藏後對熱振及藏中重要人員優加聯絡事致吳忠信代電，1939年9月11日，《達賴轉世檔》，頁 241。

對西藏的統治。¹⁴²此外藏中官吏如來晤談，吳忠信必予接見，告以內地情形。¹⁴³他爲此頗爲自喜：「昔日黃專使入藏，藏方一切統制，有事只由噶倫接洽，其餘官員不准單獨來謁，即送禮物亦受統制。今則不然，各官員可以單獨晉見，即禮品亦親送來，可知藏方看待中央，今昔已迥然不同矣。」¹⁴⁴

六、現實與表述

通過上述情況我們看到，從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尋訪，到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整個過程的漢藏交涉，國民政府方面始終處於主動地位，又是勸導，又是催促，半推半拉，¹⁴⁵使得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經過至少在程序上按照國民政府的意願，依照清朝「舊例」辦理。也許在西藏方面看來，達賴轉世是宗教事務，何況民元以來，藏政府從來都承認漢藏之間具有檀越關係，接受吳忠信入藏參加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並不意味著西藏在政治上隸屬於國民政府。但是在國民政府看來，這是西藏「輸誠中央」的表示，象徵著國民政府對西藏主權的行使。¹⁴⁶在達賴喇嘛坐床典禮舉行的同一天，國內主要報紙如《中央日報》、《新華日報》、《新民報》等發行特刊，進行報導，蒙藏會爲此撰稿5篇，廣作宣傳，稱「此次西藏當局對達賴大師轉世事，悉遵中央意旨辦理，尤足證明我國內各民族精誠團結，擁護中央之真誠」。文章還將達賴轉世和抗日救國聯繫起來，號召蒙、藏、青、康各地同胞，發揮佛法降魔的精神，在中央統一抗戰旗幟之下，對破壞佛教滅絕人道的倭寇，痛加撲滅。¹⁴⁷

¹⁴²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71、299。

¹⁴³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65。

¹⁴⁴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299。

¹⁴⁵ 按華寄天的話說：關於此次靈兒一切事宜，均係職等誘導使之呈報，非出於藏方之自動。華寄天致趙丕廉電，1939年10月30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277。

¹⁴⁶ 蔣介石爲到藏後對熱振及藏中重要人員優加聯絡事致吳忠信代電，1939年9月11日，《達賴轉世檔》，頁241。

¹⁴⁷ 蒙藏委員會爲慶祝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請發行特刊致各報社箋函並擬送特刊文稿，1940年2月18日，《達賴轉世檔》，頁299-309。

國民政府當時偏安西南，沒有實力徹底處理漢藏政治問題，它的負責藏事各人員因而特別注重「體制」，堅持「舊例」，強調中央的「威信」。吳忠信曾坦然承認，處理藏事「非威信並立不可」，否則「一切無從推動」。¹⁴⁸他以及孔慶宗、張威白、華寄天等人人都明白，此次達賴轉世對漢藏關係有莫大影響，所以對藏政府「一面導其遇事呈報中樞，一面告其率由舊章」，¹⁴⁹煞費苦心，力求至少在程序上取得完滿結果。因為如此，他們往往只能作表面文章，正如上述周昆田在吳忠信一行抵達拉薩之日致中央通訊社的電報所顯示的：大力宣傳西藏當局和人民對國府代表歡迎之隆重熱烈，根本不提更為敏感關鍵的漢藏政治問題。顯然，現實與表述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在近代漢藏關係史上，這種在公開宣傳場合「避實就虛」、「報喜不報憂」的做法並非特例。筆者注意到，當 1935 年黃慕松完成致祭並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使命返回南京後，曾撰文發表在《開發西北》雜誌上，內稱藏民對中央大員非常歡迎、對西藏應與內地徹底合作之真諦亦能瞭解，中國文化已深入西藏全境；¹⁵⁰卻避而不談在拉薩期間與西藏當局商談漢藏關係的種種不快，以及前述雙方更為根本的意見分歧。

對於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證經過，吳忠信在其使藏報告中指出，是「熱振以西藏僧俗官員咸認拉木登珠為真正之達賴化身，希望免予掣簽」，並具文呈請他轉呈國府核定後，才舉行坐床典禮。然而他完全沒有提到在他抵藏之前，拉木登珠即已被藏政府認定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真正轉世。¹⁵¹國民政府那時對達賴靈童並無否決之權，¹⁵²當事者並非不清楚這一點，但茲事重大，「關係中央在藏政權之隆替」，因此，他們不得不在文字表述上有所斟酌、修飾，以凸顯國民政府對西藏主權之行使與拉薩當局對「中央意旨」之尊重。吳忠信還在報告中稱，當他前往羅布林卡親自「考察」靈童時，「頻以問題詢之，彼均能

¹⁴⁸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70。

¹⁴⁹ 張威白致吳忠信電，1938 年 11 月 13 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 108。

¹⁵⁰ 黃慕松，〈入藏經過及感想〉，《開發西北》，卷 3 期 3（1935 年 3 月），頁 89-92。

¹⁵¹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5-148。

¹⁵²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頁 329。

含笑作答」。¹⁵³這和當時就在附近的、他的隨員朱章的記載完全不同，據朱章描述，當吳忠信談話時，拉木登珠報以微笑，卻始終不答一言。朱章還聽說，雖然拉木登珠出生於漢地邊緣，被選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時已略通漢語，但是總堪布等人每日督促拉木登珠學習藏文藏語，嚴禁以漢語應對。¹⁵⁴如此說來，拉木登珠更不可能對吳忠信「含笑作答」了。吳忠信的春秋筆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作為蒙藏會委員長，吳忠信是民初以來親臨西藏的最高級別的內地官員，但絕大多數藏人並不瞭解他的官階身分，在他進藏之前，一般藏民固然紛傳國民政府將派「安班」(Amban)進藏，高級藏官也往往以吳氏的地位詢問先行入藏專員孔慶宗等人，甚至熱振起初都稱吳忠信為主席。由於漢藏官階品級完全不同，孔慶宗等人為解釋此點，煞費躊躇，後來回答說，吳氏的地位相當於前清理藩院尙書，此次中央對達賴轉世異常重視，故特派主管邊事長官蒞藏主持。但是藏中官吏聞此既半信半疑，一般藏民亦仍以「安班」相稱而不呼吳委員長。¹⁵⁵安班者，清朝欽差駐藏大臣也。實際上，國民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員亦往往以「安班」自許，並要求藏政府至少以接待「安班」的規格接待自己。吳忠信非常在意自己作為中央大員的身分和地位，他在日記中對西藏當局及人民對他的歡迎儀式敘述備至，並在使藏報告中特別提及他抵達拉薩之日受到的歡迎儀式，「即對達賴喇嘛，亦不之過」。¹⁵⁶他又對比當英國錫金行政長官古德隨後到拉薩時，藏政府對其歡迎遠遠不及前次歡迎他本人來得隆重熱烈：「聞藏方只派兵二百人，噶廈亦只派代表一人往迓以外，民眾寥寥。」¹⁵⁷他還說，當古德於達賴坐床後的次日前往布達拉宮晉見時，坐東向西，地位尚不及噶倫。¹⁵⁸

¹⁵³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9。

¹⁵⁴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 62-63。

¹⁵⁵ 朱少逸，〈拉薩見聞記〉，收入《三種合刊》，頁 37。

¹⁵⁶ 〈吳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報告〉，收入《報告書》，頁 142。

¹⁵⁷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55。

¹⁵⁸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69。

吳忠信本人對他就此次達賴轉世的處理似乎相當滿意。但是從長遠分析，得失之間卻不好評述。作為近代西藏歷史和漢藏關係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徵認坐床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前人多有討論。他們的觀點大致可分為兩類：一些學者認為國民政府在這一事件中的舉措，體現了其對西藏固有主權的實施；¹⁵⁹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吳忠信使藏及其在拉薩的活動，充其量不過為國民政府爭得一些面子，以及達到某種宣傳效果罷了。¹⁶⁰然而，或由於資料的限制，或因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或受其政治立場的左右，他們的論述未盡周全。在我們利用新出材料將漢藏雙方有關這一事件交涉經過的基本史實陳述清楚之後，我們看到，一方面由於吳忠信、張威白等人的主動，藏政府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國民政府的意願，依照清朝「舊例」辦理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手續；另一方面，他們認識到自己並沒有足夠實力為後盾，所以只能力求程序的完備，而無法影響藏政府對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的具體操作。

這種做法，從長遠看，固然有一定現實意義和作用，¹⁶¹但在當時，是否達到吳忠信所希望的「樹立信用、收拾人心」的目的是值得商榷的。如上所述，吳忠信在拉薩期間處處強調中央的「尊崇」與漢官的「威儀」，並不惜因此使藏人不快，¹⁶²這固然表現了國民政府的官員在西藏享有某種特殊禮遇，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西藏方面對吳忠信本人印象不佳，以至於當 1946 年藏政府派

¹⁵⁹ Tieh-tseng Li,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pp. 180-185; 馨庵,〈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認定和坐床考實〉,《中國藏學》,1995 年第 3 期,頁 47-55;黃維忠,《法座下的較量：十四世達賴喇嘛尋訪認定與坐床紀實》,頁 161-163;周偉洲,〈關於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若干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卷 17 期 2 (2007 年 6 月),頁 77-89。

¹⁶⁰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頁 329-330;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7;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pp. 115-117.

¹⁶¹ 吳忠信是否「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一直是有關國民政府與西藏關係的論述中具有爭議的問題之一。參見 Hug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Boston: Shambhala, 1984), pp. 150-154;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pp. 285-286; 周偉洲,〈關於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若干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卷 17 期 2,頁 79-89;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1.

¹⁶²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45、263。

代表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國民政府準備指派人員與之交換有關漢藏關係的意見時，時任駐藏辦事處處長的沈宗濂(1898-1978.11)建議不宜加入吳忠信，因「藏方對吳頗有誤解」。¹⁶³進一步講，拉薩當局亦沒有因吳忠信入藏「主持」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而承認和國民政府具有政治上的隸屬關係，更在 1949 年 7 月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前夕，將其駐藏官員全部驅逐出境。其次，吳忠信在事先沒有與藏方協商的情況下，成立駐藏辦事處，從藏人的角度而言，駐藏辦事處的設置並未得到噶廈的允許，因此不具有合法地位，¹⁶⁴從而為此後數年間駐藏辦事處與藏政府的緊張關係埋下隱患。再者，熱振執政以來和國民政府往來密切，一向被視為「親漢」之人，¹⁶⁵在這次雙方關於達賴轉世的交涉中，熱振的態度較為溫和，接受吳忠信入藏，並大致按照國民政府的意願辦理有關手續，國民政府自此便正式確立了在政治上「扶持熱振，使親漢派漸握實權」的對藏政策。當吳忠信在拉薩之時，他曾向熱振「極表切實維護之意」，囑言「熱振個人如需要幫忙，中央必努力為之」。¹⁶⁶在隨後幾年裏，國民政府派駐西藏的特工等人員更和熱振過從甚密。然而不幸的是，這後來成為熱振在壯年被藏政府殺害的重要原因。當然，這已經是另一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了。

¹⁶³ 沈宗濂致蔣介石呈，吳鼎昌呈核，1946 年 8 月 30 日，〈國民政府檔〉，檔號 0592/4410.01-01，「藏王達札與熱振交惡」，微卷 419/0797。

¹⁶⁴ 外交部情報局關於記者就西藏設立外交局等事採訪該局首腦情報，1942 年 12 月 14 日，〈關係檔彙編〉，冊 7，頁 2849。

¹⁶⁵ 1936 年初，熱振派其屬下龍圖嘉措到南京為熱振寺募捐。龍圖嘉措也兼做生意，購買內地貨物到西藏銷售，獲利不菲。國民政府還贈送很多財物給熱振。參見沈重宇遺稿，沈元加整理，〈回憶蔣介石重慶行營對西藏問題的研究片斷〉，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第 15 輯，頁 171；藏王致蒙藏委員會譚轉隆圖嘉措等電，藏曆土虎年(1938)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入《駐藏檔選編》，頁 34；熱振為請吳忠信飛青與靈童同行入藏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 年 4 月 29 日，〈達賴轉世檔〉，頁 189；〈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95。

¹⁶⁶ 〈吳忠信入藏日記〉，收入《報告書》，頁 271、299。

徵引書目

一、原始檔案

- 臺灣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檔號 172-1/0010/019/42，「派員入藏事案」。
- 臺灣國史館藏，〈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檔號 0592.50/3457.01，「達賴轉世案」。
- 臺灣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 0592.50/3457.01，「達賴轉世案」；檔號 0592/4410.01，「藏王達札與熱振交惡」。
- 臺灣蒙藏委員會蒙藏文化中心圖書室藏，〈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卷 42/R3/06/017，「議事紀錄及參加中國邊政學會」。
- 《1899-1949 年有關西藏問題歷史檔案資料彙編》上、下，光碟資料，出版地出版社及年份不詳。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 Oriental &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in A. J. Farrington, ed. *British Intelligence on China in Tibet 1903-1950* [microfilm]. Leiden: IDC, 2002.

二、專書

- 《吳忠信先生紀念集》，出版地出版社及年份不詳。臺北：蒙藏委員會蒙藏文化中心圖書室藏。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黃慕松、吳忠信、趙守鈺、戴傳賢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
-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王 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青海三馬編輯組編，《青海三馬》。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 多傑才旦主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冊 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使藏紀程、拉薩見聞記、西藏紀要三種合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
- 呂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 拉魯·次旺多吉，《拉魯家族及本人經歷》，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16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 孫子和，《西藏史事與人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 馮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臺北：故宮博物院，1996。
- 黃維忠，《法座下的較量：十四世達賴喇嘛尋訪認定與坐床紀實》。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冊2。臺北：蒙藏委員會，2005。
- 鄧銳齡、陳慶英、張雲、祝啓源，《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 Bstan vdzin rgya mtsho, Dalai Lama XIV.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Autobiograph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7.
-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Gould, B. J.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 Jagou, Fabienne. *Le 9e Panchen Lama (1883-1937), Enjeu des Relations Sino-Tibétain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2004.
- Lamb, Alastair.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 Lamb, Alastair.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6.
- Lamb, Alastair.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Roxford Books, 1989.
- Li, Tieh-tse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Toronto: UBC Press, 2006.
- Liu, Xiaoyuan.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cKay, Alex.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7.
- Palace, Wend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1922*.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5.
- Powers, John.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ichardson, Hugh E.. *Tibet and Its History*. Boston: Shambhala, 1984.
- Shakabpa, Tsepon W. 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perling, Elliot.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4.
- Thub bstan sangs rgyas. *Rgya nag tu bod kyi sku tshab don gcod skabs dang gnyis tshugs stangs skor gyi lo rgyus thabs bral zur lam zhes bya ba dge'o* [憶述漢地的西藏辦事處].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82.
- Tsarong, Dundul Namgyal.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The Biography of Dasang Damdul Tsarong*,

Commander General of Tibet.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2000.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三、論文

扎 洛，〈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候選人拉木登珠 1938-1939 年間滯留西寧問題探析〉，《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卷 25 期 2，2004 年 3 月，頁 29-35、56。

朱麗雙，〈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民國政府的西藏特使們，1912-194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6。

沈重宇遺稿，沈元加整理，〈回憶蔣介石重慶行營對西藏問題的研究片斷〉，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15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拉烏達熱·土丹且達遺作，〈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見聞〉，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8 輯。拉薩：西藏軍區印刷廠，1986。

金紹先，〈憶述國民黨元老吳忠信〉，收入文史資料研究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8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周偉洲，〈關於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若干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卷 17 期 2，2007 年 6 月，頁 77-89。

柳陸祺、鄧銳齡，〈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籤的經過〉，收入鄧銳齡，《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

夏扎·甘登班久，〈憶吳忠信來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片段〉，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84。

莫如志，〈馬步芳經營「協和商棧」的內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85。

陳慶英，〈清代金瓶掣籤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實施〉，《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卷 27 期 3，2006 年 5 月，頁 1-6；卷 27 期 4，2006 年 7 月，頁 1-10；卷 27 期 5，2006 年 9 月，頁 7-14；卷 27 期 6，2006 年 11 月，頁 1-8。

張慶有，〈拉卜楞寺活佛轉世資料〉，《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290。

黃慕松，〈入藏經過及感想〉，《開發西北》，卷 3 期 3，1935 年 3 月，頁 89-92。

韓永鵬遺稿，〈馬步芳派我赴西藏黑河解圍和掠奪物資的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青海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出版地及出版單位不詳，1964。

馨 庵，〈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尋訪、認定和坐床考實〉，《中國藏學》，1995 年第 3 期，頁 47-55。

鐵進元，〈第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坐床側聞記〉，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卷 1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Gould, B. J. "The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n Alex

-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Khemey, Sonam Wangdu. "Discovery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An Eyewitness Account." Translated by Thubten K. Rikey; in Khemey Sonam Wangdu, Basil J. Gould and Hugh E. Richardson, *Discovery, Recognition and Enthronement of the 14th Dalai Lama: A Collection of Accounts*.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2000.
- Petech, Luciano. "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 A Chronological Study."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Richardson, Hugh E. "The Dalai Lamas."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Vol. 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The Specially Appointed High Envoy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14th Dalai Lama

Zhu Li-s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on the basis of newly-found sources, a more detaile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a long series of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first on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to Lhasa of a divine boy, recognized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n on the official rituals to be conducted to confer on him the recognition of his spiritual leadership. Scarcely had the report that the boy-incarnate had been found in Amdo, Qinghai, a province under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Muslim warlord Ma Bufang, circulated early in 1938 when Tibe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Qinghai local authorities began playing a complex gam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o achieve their calculated ends. Tibet needed the divine boy, and moreover to vindicate Tibet's own rights, wanted to officially enthrone him as the 14th Dalai Lama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other authorities. Ma Bufang refused to let the boy-incarnate be escorted out of Qinghai to Lhasa without payment of a large sum of mone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ving moved to Chongqing, Sichuan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1937-1945), wanted t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assert its sovereign authority over Tibet by reference to the established model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due to the weak posi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Wu Zhongxin, the chairman of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nd other

*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airman of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nd other Nationalist officials in Lhasa had to take great pains to have the recognition and installation ceremonies of the 14th Dalai Lama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ing precedents. They engaged in a series of difficult negotiations with the Tibetan senior spiritual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They attempted to portray their activities in a manner that suggested China still exercised sovereignty over the Lhasa authorities. The substantial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was happening in reality and what was chosen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ir official reports and public account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explore the already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Republican China and Tibet.

Keywords: Dalai Lama, recognition,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u Zhongxin